

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

——第二届 20 国智库论坛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 20 国智库论坛——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国际研讨会”于 9 月 3 日—4 日在北京召开,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增长实现之道。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在 2500 多年前就曾经提出过“天下大同”思想,金融危机中诞生的 20 国集团机制构筑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将拥有全国六成人口的主要经济体纳入进来,共同应对挑战,合作解决国际经济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进行着“天下大同”的理想。20 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即将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16 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此次来自 20 个集团成员方以及国际组织智库的嘉宾们齐聚一堂,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在 3 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教授致辞,他说,“G20: 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来自 20 国集团成员重要智库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学者们,以及政界、商界、学界的朋友们共聚一堂,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路径以及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献计献策。

他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他说,卡特总统是 2002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多年以来他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特总统莅临“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国际研讨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今天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再次参加我们的会议,卡洛斯先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曾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际治理改革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马格里诺斯支持帮助下,人民大学去年成功召开了第一届 G20 智库会议,再次我也要对马格里诺斯先生表示感谢,驾临机制诞生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各成员方之间通过相互分享智慧,达成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智库层次是国与国之间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对各国的决策选择也日益重要,去年共同声明中的 G20 智库年会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在今后的 5 年,全球经济将进入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期,G20



形成的良好传统需要连续发扬,智库层次建立常规,沟通协调网络将有助于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

中国有句古话,“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驾临各成员方的智库为全球治理的共同目标而凝聚共识,群策群力,则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目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处在重要的时刻,重建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新的金融价值观以及合作框架,此次会议的意义将十分重大。

陈雨露教授在致辞结束前特别提到一点:“卡特总统在一个月以后将会迎来他的 90 岁生日,我想借此机会来祝贺卡特总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接着,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来自阿根廷的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先生做主旨演讲,他也是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他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博士王文为 20 国集团峰会及全球经济做出的诸多贡献。

他说,该会议在全球经济千钧一发的时刻召开,人们对 20 国集团恢复经济增长,确保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的作用是满怀

希望的,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金融危机结束了所谓大缓和的时期。期间,就业情况、GDP 和收入水平稳定上升但涨幅有限,未来注定存在更多的波动性,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更高的失业率。基于这种状况显然使得他们面对这种情况究竟如何决策,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努力地重回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比如说 2001—2007 年期间的增长水平,对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经济目前正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持续增长的状态,我们可能会觉得今年第一季度表现会有点反常,但是经济增长水平重回危机之前的期望有望在今年实现。

美国第 39 任总统,2002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吉米·卡特在演讲开始前说:“我要谈一谈全球治理,这是我的任务。”他在演讲中回忆起和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共同的愿景:“我们都有一种梦想,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可能有 30 来年没有打交道了,应该治理国家关系正常化。我们非常秘密地来进行谈判,大概在 1978 年的时候,在那年的 12 月中旬,我们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宣布我们将会有一正

常的外交关系。”

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是非常成功的,是有利于世界的。我们与此同时看到其他国家的崛起,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或叫金砖国家,这些新兴国家现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我的国家仍然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接受新近发展的动态。”我们之间要消除不可避免的差异,我们都有这样的权利和责任,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消灭冲突,说实话,美国是超级大国,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容易的挑战,要解决问题靠美国一个国家并不是可靠的事情。我们不能放弃当年的梦想,就是邓小平和我当年建立的这个和平的梦想。

我们可以倡导和平、人权以及环境治理,我希望这个论坛能够在澳大利亚召开的时候或者其他地方召开的时候能够倡导这些理念。

开幕式结束之后,陈雨露、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吉米·卡特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阿根廷的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致辞

经济增长水平有望今年回到危机前

毫无疑问,该会议在全球经济千钧一发的时刻召开,人们对 20 国集团恢复经济增长,确保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的作用是满怀希望的,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金融危机结束了所谓大缓和的时期。期间,就业情况、GDP 和收入水平稳定上升但涨幅有限,未来注定存在更多的波动性,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更高的失业率。基于这种状况显然使得他们面对这种情况究竟如何决策,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努力地重回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比如说 2001—2007 年期间的增长水平,对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经济目前正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持续增长的状态,我们可能会觉得今年第一季度表现会有点反常,但是经济增长水平重回危机之前的期望有望在今年实现。

去年早期日本通过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成功解决了困惑消费者的物价通货紧缩的问题,但近期数据显示,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去保持过去 12 个月实现的增长态势,以消除消费税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恢复经济可持续发展。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目前正面临低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的风险,2013 年春天经济增长开始显现复苏的迹象,而该经济增长迹象正好和主要欧洲经济体的糟糕表现相中和了,尽管经济恢复出现了种种好的态势,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经济体的 GDP 不断增长,英国经济体也表现良好,但是失业问题仍然不容忽视,预计未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将不同于它们在过去 10 年里特殊期间内所经历的种种状况。此外,多亏了亚洲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的经济体,不管是他们是拥有积极进取还是固步自封的政府,不管他们的规模大小,不管他们的经济政策是否完善都正以快速的速度增长,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国内政策是否完善和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表现将息息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策略的优劣。

亚洲经济活动整体较为稳定,拥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尽管政策的重点在大范围内可能不尽相同,但供给方面的体制改革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的态势,印度新政府进行新的预算,并仿照中国的再平衡行动,解决其经济制度的缺陷和薄弱点。

以此恢复经济增长这一点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而且其效仿中国一些措施同样是以全球层面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历了历史上的全球经济大缓和,非洲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而在整个非洲地区其经济实力依然薄弱,这更多的由于其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和缺陷所造成的。和危机前的经济平均增长水平相比,该地区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水平。过去十年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也可圈可点,达到了 2001—2007 年的水平,但是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尤为缓慢,除了货币宽松,用以缓和外部冲击的浮动汇率,加强财政状况以外,体制改革在提高产能以及促进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领域更多更好地投资方面也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缓和,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还很不平衡,经济缓慢恢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尽管在更为严苛的金融环境下,新兴经济活力表现依然有限,但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了 2/3 的贡献,尽管不同 20 国集团之间的政策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面对共同的挑战,汇率的有效性予以保留,以有效解决经济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且能够应对外部调整以及外汇干预期所带来的挑战,从而缓解金融波动带来的影响,我们改善财政收支平衡,保持债务水平。

货币宽松政策对成熟的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在实现目标前可以避免宽松政策的缩减,在欧元区我们已采取独树一帜的措施,已恢复经济增长速度,避免通货紧缩现象,欧洲银行希望仔细考虑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建议一定程度上还包含日本银行的建议,我们应对长期财政整顿以及债券、股票予以合理重视,并制定中期调整方案。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很自然希望 20 国集团在 21 世纪全球的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认为其他 20 国集团的成员日益紧密的事实也更加证明了其重要性,各种各样的事实明确表现,如果我们还未处于世界变化的交叉路口,目前我们至少趋于全球经济发展新时期阶段。就购买力评价而言,新兴经济体今年首次为全球 GDP 做出 50% 的贡献,这个趋势似乎可为统一全球经济格局的分配指明方向,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另外产一个单一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即全球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考虑到人们每天的花费在 10—100 美元之间,最近 10 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会大幅度增长。根据多项预测,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截至 2020 年将会从 2010 年的 18 亿增长到 32 亿,而其中大多数都居住在亚洲。全球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会获得显著提升。

2009 年中产阶级的消费额刚超过 210 亿美元,而到 2020 年底则有望超过 350 亿美元,其中亚洲消费比例占据该消费能力的 42%。20 国集团在处理系统性风险,预防关键风险情形方面任重而道远。尽管在金融危机关键时刻达成的决议还未完全执行,但可以通过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金融监管,并汇报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在修订和更新巴塞尔协议三,以及衍生协议,场外产品以及所谓的影子银行系统操作方面的进展,我们还应特别重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

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加强和完善相互评估的程序。通过 20 国集团完成在强劲、可持续、平衡框架下的任务,一些其他的事宜,比如区域金融安排、双边信贷互惠协议、应急储备协议正在不断地加强,我们应予以重视。

20 国集团将致力于建立包括近期食品和能源安全等全面的、长期的议程,但是仅将基于早期的成功去应对对新的世界权力结构下的双边治理挑战,我们应在议程中所提出的日益增加的要求,愈加严格的议题出现的可能性予以重视。20 国集团可能会希望集中力量从所擅长的领域,比如说对金融领域所做的一样,消除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形。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联系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调研,但是我们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的形势正是由全球现在从金融危机当中已经出现了缓慢的复苏迹象。这样的诠释由于全球金融产品供应不足所造成的,为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20 国集团以更加战略性的方式着力解决全球以公共产品为主的相关问题,以期共同努力在环境、基础设施融资、贸易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出口额,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不断增多,贸易便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去年在巴厘岛达成的关于贸易便利的单一多回合协议近年受阻,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与之相关的全球价值链问题,诸如国际贸易、投资流动、技术转让也日益纳入议事日程,这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我们也不应忽视国内政策的价值以及反思传统经济政策对现有经济增长的需要。我确定在为期两天的峰会中与与会者积极探讨新措施以及新思路,并为下一届 G20 布里斯班峰会提出一系列相关建议。

“答记者问

大金融与综合增长世界的建议

“目前全球治理的障碍到底在哪里”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非常感谢您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在演讲当中试图谈到我们非常重视全球治理,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来一点,我们全球社会应该来讨论和纠正全球货物供应不足,曾经谈到国别经济和不同的国家,比如说影响到它的安全,还有一些国家的卫生运动。

在政府提供的这个全球公共商品,在国际上我们有巴塞尔三的改革与更新,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讨论全球的协调和治理,我们要保证提供全球公共货物。当时我在 UNIDO 工作的时候就引发这样的讨论,认为供应不足是造成全球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可以进一步贯彻到我们 G20 会议当中,这样就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关切,我们现在很多议程的内容过于繁多,在上一次会议上,我想 G20 应该提高它的有效性。看到多边经济合作,要增长这样的优势,要建立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卡特总统先生刚才谈到环境问题,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创造就业,建立投资和全球供应链都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期待我们的表现,我也非常坚信这是我们未来,不光是一些机构,还可以消除不同的区域之间的差别,使我们可以来携手合作的,在区域的组织或国家层面进行合作来消除我们的一些关切。

“如何推进和落实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吉米·卡特: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要素方面。我们也认为中国是美国很好的一个贸易伙伴,我们开展的贸易,在中国销售,比如手机、电脑在中国销售并且在中国生产的,可以看到美国是欢迎这样的发展。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购买国,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中国购买了美国国债,在美国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出现了波动,所以两国有一些关切,说是不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关系上的变化。

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强大,在二战之后当时美苏争霸,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当然美国也非常强大,前苏联已经解体了,但不是美国造成的,它是内部问题造成的。我们并不认为美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我们认为中国能够很好地应对自己的问题,能够发挥支配性的一些作用,在和美国合作的时候,在解决世界问题的视野都是如此,美国和中国都有相互尊重,像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就进行过访问,说两个国家可以相互协作来一起前进,来倡导和平、和谐以及实现经济的繁荣,这种关系是邓小平当年所推动和梦想的。

尽管我们发现今天过去了好多年,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都有这样的联系,尽管我们有一些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现在联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不断地来减少这样的分歧,进行合作。

“全球金融治理机构该如何进行改革”

陈雨露:“大金融理论”是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团队共同提出来的一个关于危机后的金融理论,在过去 400 年的历史里边一共发生了 68 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但是综合分析下来,实际上教训就是三个:金融不能够过度地自由化;金融不能够过度地泡沫化;全球化的时代应当有一个好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所以,“大金融理论”有三个核心的建议:

第一,在金融监管的范畴上应当实施全口径的监管,不管是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基础性的金融产品还是衍生金融产品,不管是我们讲台内的交易还是场外的交易,都应该纳入到金融监管的视野当中来,不能让某一块的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业务游离在金融监管的视野之外,不能让它过度地自由化。它非常容易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二,在金融的价值观上,也就是金融应当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现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把金融抽象掉了,这恐怕是问题的理论根源。金融和实体经济应当有机地结合。比方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的综合增长,只靠货币金融政策是不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不仅需要和财政政策协调,也需要和实体经济的政策协调,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必须要解决产业创新的融资需求问题,必须要很好地解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稳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形成金融的泡沫化。

第三,全球金融的治理应当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因为到 2013 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 GDP 的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到了 49.1%,接近了一半,今年可能就超过了一半。所以,全球化的问题必须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G20 实际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机制,这个机制在这次面向未来的时候,不仅不应该被弱化还是应当常态化,并且要提升 G20 在全球经济、金融协调方面的权威性和它的执行力,只有这样,我想我们全球的经济才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并且面向未来取得更加健康的、可持续性的、少危机的增长。